



本土研究的 危机与生机

中西对话
汪琪 主编

汪琪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西对话
汪琪 主编

本土研究的 危机与生机

汪琪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本土研究的危机与生机/汪琪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1

(中西对话)

ISBN 978 - 7 - 5675 - 4656 - 1

I. ①本… II. ①汪… III. ①社会科学—研究 IV. ①C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21694 号

中西对话系列:

本土研究的危机与生机

著 者 汪 琪
策划编辑 王 焰
项目编辑 朱华华
审读编辑 刘 琼
责任校对 冯朝霞
版式设计 卢晓红
封面设计 崔 楚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苏州美柯乐制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32 开
印 张 7.5
字 数 176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675 - 4656 - 1/G · 9033
定 价 29.8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丛书序

清末民初的百年间西学东渐，中国的思想与学术在一场惊天动地的典范转变后，逐渐陷入一个历史学家余英时所谓的“双重边缘化”困境。在理论知识上忠实追随西方，不仅使我们在国际学术版图上沦为边缘，研究对本土社会文化发展的贡献也颇为有限。华人社会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上年复一年投入庞大人力与资源，追求国际竞争力，但我们是否真正了解“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意义？在 21 世纪的今天，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看待西方、重建“主体性”，又如何在学术上与西方对话？

许多人急于提出“本土理论”，然而理论知识的产生必须由更根本处着手。无论是对西方论述的回应或评论、由现代学术的观点诠释传统、检视中西思想交流，或直接面对本土学术议题，系列丛书的目的都在以一种较一般“本土化”论述视野更为宽广的思维，来推展本土学术可长可久的发展。

导 读

肖小穗 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教授

过去三十年间,海峡两岸和港澳台地区有关“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讨论此起彼伏,文章写了很多,研讨会、对话会和座谈会开了不少,会议后的论文汇编也出过若干本。在传播研究方面,最近的有汪琪编著的英文专集《传播研究去西方化》(Wang, *De-Westernizing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ltering questions and changing frameworks*, 2011)、冯应谦、黄懿慧合编的《华人传播想象》(2012),以及黄旦、沈国麟合编的《理论与经验——中国传播研究的问题及路径》(2013)。但独家发表的专著,目前还只有汪琪这部《本土研究的危机与生机》。行内早在打听这本书的“产期”,一年多前《传播与社会学刊》邀请汪琪参加了一场“学术对谈”,谈的就是她对目前传播研究本土化的看法(汪,2014)。作为学刊一方的对谈人,我捷足先读了这部书稿,对谈时更是近水楼台,提出了一些问题,得到汪琪的解答,受益匪浅。所以我很愿意为这部新作写些什么,虽然自忖没有评价它的资格,但还是愿意分享我的点滴心得,希望能起点“导读”的作用。其实在介绍那次“学术对谈”的“卷首语”(萧,2014)中,我已多少写下了一些感受,但意犹未尽,这次正好把我当时未来得及说的话补上。

要理解汪琪的这部新作,得从她本人的履历说起。汪琪有学贯中西的宝贵经历:出身于外交官世家,早年在海外耳濡目染;在美国攻取博士之后,先在美国东西文化中心从事研究,后返台湾执教,并致力于本土研究;在台湾、香港等地担任传播学讲座教授和院长期间,更积极推动本土与国际的学术交流。这一特殊经历让汪琪的本土化见解具有一种恢宏的国际视野。值得一提的还有汪琪长期主持“本土化研究”的资历。早在1998年,汪琪就已启动其“本土化研究”的大计,开办过数次工作坊。由香港回台北后,曾主持一个“顶尖大学研究计划”,主攻传播研究的本土化,为此她举办过国际学术会议,会议论文后来汇编成上述的英文专著(*De-Westernizing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11)和一本期刊专辑(“Asi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ferment,” 2009),分别由劳特利其出版社(Routledge)和《亚洲传播期刊》(*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出版。之后,汪琪又开启一个“中西对话系列丛书”的计划。新的研究经历再次拓展了汪琪的视野,她于是重新检讨第一代学者的本土化论述,这次检讨造就了她的新著《本土研究的危机与生机》。

不消说,这部专著的起点较高。汪琪其实是从她所催生的第二代本土论述的高度上来检视过往的研究。这一高度自然与汪琪长期主持本土研究的资历相关;但是话说回来,仅仅是“资历”和“辈份”不足以解释这部专著的思想高度,“资历”和“辈份”并不决定汪琪要来检讨过往的本土研究。汪琪的“第二代”观点与其说是反映了学界的主流意见,不如说是来自她个人的深刻反思和批评意识。

的确,这部专著比现有的许多本土化论述站得更高,也走得更远。她所追求的本土化“不只在于回归本土、也在走出本土”(第259页)。在她看来,70年代以来海峡两岸和港台地区的学界发起的“本土化”运动

看似一路高歌猛进,但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某个瓶颈。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令人焦虑的,是不但‘本土化’概念掺杂了许多似是而非的说法,学界对于本土学术发展也呈现两极化倾向:或是追随主流、或是专注本土”(2014,第4页)。这一问题反映出学界并不真正了解“本土化”的目的,因此不清楚应该如何实现“本土化”。汪琪认为“本土化”的最终目的是提出自己的看法,与国际主流对话(2014,第9—11页)。

回归本土不难,走出本土也不难——早在上世纪20年代的“科玄论战”中打得不可开交的“玄学派”和“科学派”就已经分别这样做了;难的是两者结合。在我看来,汪琪的心始终是向着本土的,言语间处处流露出对本土的眷顾。据汪琪自己说,她早年的几本著作“都是在凸显媒体的文化特色、‘在地’观点或经验”(2014,第4页)。这次回首过去,其用意也是要寻求本土研究的生机。正是因为有她“立足本土”之情深,才有她“走出本土”,“与主流对话”之意切。

汪琪清楚地意识到,“只是凸显本土经验是不够的,因为本土学术发展最终无法回避理论层级的讨论与对话”。为此她建议我们走出“本土、国际”二分的思维模式,而要这样做:首先,要小心使用“本土化”这一概念,原因是它“掺杂了许多似是而非的说法”,其中包括了本土“在地化”、“典型化”、“本质化”、“中国化”、“港台化”等片面的说法(2014,第2—10页);更有甚者,这个“化”有演化成狭隘的本土主义之危险,汪琪相信狭隘的本土主义没有出路,只会把本土研究引向一种极端的做法,或是“专注本土”,或是“追随‘西方’主流”。不幸的是,她看到这种两极化的危险正在成为现实,许多华人学者都在忙着经营自己的一小块“本土”,结果是没有“整合性的整理与分析”、“欠缺理论论述”、“不事经营学术主张”、“对于研究问题与观察角度欠缺自主性”、“被动地‘套用’或‘照搬’现成

理论”，最后事与愿违，“华人学者基本上都仍然是在复制西方的理论论述”（第22—38页）。

今天，“本土研究的危机与生机”取决于它能否超越过往研究的问题意识。在我看来，这部新著最有价值的地方还不在于它给出的答案，而在于它引发我们去思考的一系列新问题。譬如，“本土文化”是否可以还原为某种“本质”？是否有必要区分“本土”与“非本土”研究？扎根于“本土”的研究是否就是“本土研究”？我们是否有评判“本土”的客观准则？本土化是否应该牵扯上族群情结？研究传统的观念和方法是否就是本土研究？如何避免西方视角和西化立场？……这些问题是冲着目前本土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来的，所以不是一般的问题。我们不一定认同这里的每一个问题，但不能不承认它们都根茎相连，牵一发而动全身。若单独来看，这些问题也许不是什么新问题，也许都在这样那样的场合被人讨论过。但总体来看，它们展现了一种新思维，新在它们超越了本土、外来二分的思维模式，也就是说，它们是在一个新的、开放的思维框架下和盘端出来的。不错，我们仍然可以坚持旧的本土化思路，并从这一思路上来回答上述问题，但不可否认，这些问题的提出本身已经开放了从另外一个思路上来回答的可能性。新一代本土学者不是非要在汪琪的问题框架下思考和工作，但起码要响应汪琪的问题，并要尝试给出合理的说法。

新一代本土学者要走出本土，与国际学术对话，意味着他们还必须摆脱“特殊、普世”二分的思维模式。汪琪很清楚，如果我们仍像西方和本土许多学者那样，简单地套用这个二分模式来区隔本土学术和西方学术的话，对话将演变为另外一种两极化：或是各说各话（专注本土），或是搬用西方的理论论述（追随主流）。有趣的是，汪琪采取了另外一种解决

方法：在“本土”还是“国际”的问题上，汪琪的做法是“走出本土”；而在本土“特殊性”还是西方“普世性”的问题上，她却选择把西方拉回到它的“本土”原点，“西方不过是另一个‘本土’”（第30页）。既然西方不代表“普世”，对话也就不必要套用西方的论述。

但问题没有根本解决，为了避免各方学者各说各话，汪琪还“必须寻找一条‘异’中可以求‘同’的途径”，她于是主张用“可共量性”概念取代“普世性”（2014，第7页）。“可共量性、不可共量性”（commensurability/incommensurability）源自库恩（Thomas Samuel Kuhn）的“科学革命”理论。之所以要说“革命”，是因为库恩认为新的科学典范不可能从旧的典范内部自发产生出来，新旧典范使用不同的语汇，彼此无法对译和互通。库恩说它们“不可共量”，意谓它们是无可比较的。但因为“不可共量”的说法无法解释在不同典范下工作的科学家仍然可以沟通的事实，库恩在晚年修正了原先的一些说法，在他看来，“不可翻译”的语汇不一定就“不可诠释”，因此在不同典范下工作的人们仍然可以借助“诠释”来达至相互的理解（Kuhn, Conant & Haugeland, 2000, pp. 36-38）。这一修正开放了一种可能性：“不可共量”的语汇或概念经由适当的“诠释”之后是“可以共量的”。“可共量性”概念在此被汪琪用来说明本土学术在国际间与其他本土学术对话的可能性。这个“可共量性”而不是“普世性”的选择再一次显示了汪琪的本土倾向，对她来说，“‘可共量’有一个‘普世性’所没有的关键性优点，就是它所要求的是‘相似’或‘对等’、而非绝对的‘相同’；……因为只是‘雷同’，‘特殊性’就保有了一个合理的存在空间”（2014，第8页）。

由此看来，在汪琪的本土化论述架构里，“诠释”（interpretation）最后承担了促进学术对话的重托，它甚至承载了本土研究发展的希望，它

因此必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样一个论述架构决定了这里说的“诠释”既不同于“翻译”(translation),也有别于一般人所理解的“诠释”。它需要处理好“不可翻译性”与“可共量性”的关系,前者解释了本土学术的“特殊性”,后者则解释了它由“特殊”走向“共通”的可能性。因为这样,它至少要分两步走,即“由‘普世’到‘特殊’、再由‘特殊’到‘可共量性’”(第 214 页)。从另一角度来说,诠释意味着诠释者不能满足于寻求意思相等或相近的语汇,他还要“进入概念与命题的历史脉络”(第 212 页)。如何进入?汪琪提供了以下方法,它包括两个重要步骤:

首先,要扩大文献探讨(literature review)所参考的范围,不但包括相关理论过去的讨论,也包括这些理论的思想根源与历史文化背景,同时找出所有本土文献中足以连结“本土”与“外来”观点与关怀重点的论述。其次,由于这些本土观点、思想与关怀重点未必是以现代所谓“科学语言”所书写,甚且也不合乎社会科学的论述原则,因此在分析比较“外来”与“本土”的“异”、“同”及其理论上的意义之前,必须经过“诠释”与“翻译”,将其转化为得以与“外来”论述对话的语言(第 251—252 页)。

汪琪在最后一章(第六章)还提供了一个具体实施这一方法的分析案例。我个人认为,“进入概念与命题的历史脉络”是必须的,但在具体的操作上,我们可以不拘一格,我们可以有各种进入到“历史脉络”中去寻求“特殊性”和“可共量性”的途径。就是在以上方法的框架之下,我们也还可以选择不同的做法。思想史家如张灏、墨子刻、史华慈等已开拓出一些具体进入“中国历史脉络”的路径,譬如从当事人的思想环境和生存情境进入(如张灏,2006),或者从儒学传统的“共同语法”入手(如墨子刻,1996)、又或者从中国文化的问题意识(Problématiques)出发(如史华慈,见林同奇,2002),这些路径各自代表了一种处理和分析历史文献的

方法。学者在寻求进入历史文献的同时,也在寻求一种理解和对话的方式。本土的传播学者可以参考这些方法和途径。但无论是何种方法和途径,它们都将见证汪琪所说的那个“批判、吸纳,对抗、融合,破坏、建立的过程”(第212页)。

在我看来,本书有两个思想亮点,让这本视野高远的专论立足一个道德高地而又不至于高不胜寒。首先是对文化间对话的冀望。把跨文化对话看作是“本土化”的最终目的,是汪琪个人的理解和愿景,本土学者不一定都这样想,这不一定就是他们发起“本土化”运动的初衷。但我认为这是汪琪的卓识,它展示了一种国际视野,也为“本土化”或本土学术发展安排了一个美好去处,“本土化”不是闭门造车,自说自话,这毕竟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不管从哪个意义上理解它)。

其次,是汪琪对中国文化的深刻反思。她在第二、第三章指出目前“本土化”的许多问题(譬如欠缺自主性)都可以追根求源到华人文化的治学传统、教育体制、和学术政策,她的意思是要本土学者更多地思考中华文化自身的问题。对她来说:“今天华人学术发展所面对的也绝不只是一个学术帝国主义的问题,而是学术典范、教育体制与政策问题,更是历史文化问题——是一个关乎整体、而非只是‘本土’或非西方学界的问题。文化是关键,也是所有上述因素背后的根源;它不是一个冰冷遥远的研究题材,也是研究的本身”(自序)。“本土化”不是固步自封,发展本土学术与提倡文化反思不相冲突,中国文化不是也讲究反求诸己吗,所以这一要求不过份,起码在道德上说得过去。

我个人认为,汪琪在书中提出了一个理论架构,这是一个完整的架构,每个部分都经过仔细的斟酌和推敲,而部分与部分之间则由若干重要的文化价值理念铆接在一起。任何理论架构都需要某些价值理念从

中穿针引线,所以不是问题。我倒认为汪琪对跨文化对话的热切关照和她强烈的反思意识正好凸显出她的本土化论述的主要特色。

参考文献

- Kuhn, T. S., Conant, J., & Haugeland, J. eds., *The Road Since Structure: Philosophical Essays, 1970 - 1993, with an Autobiographical Interview*,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 Wang, G. ed., *De-Westernizing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hanging Questions and Altering Frameworks*, (London: Routledge, 2000).
- Wang, G. ed., Special issue: Asi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ferment-Moving beyond Eurocentrism,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4), 2009.
- 冯应谦、黄懿慧编:《华人传播想象》,香港: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 2012 年。
- 黄旦、沈国麟编:《理论与经验——中国传播研究的问题及路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 林同奇:他为我们留下了什么:史华慈史学思想初探,《世界史学》,2002 年,第 2 期,第 38—66 页。
- 汪琪:本土传播研究的下一步,《传播与社会学刊》,2014 年,第 29 期,第 1—15 页。
- 萧小穗:走出简单的二分模式,《传播与社会学刊》,2014 年,第 29 期,第 v—x 页。
- 墨子刻:《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Escape from Predicament: Neo-Confucianism and China's Evolving Political Culture*),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 张灏:《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 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 1890 - 1911*)(高力克、王跃译),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6 年。

自

序

或许是自己的生长环境与经历，文化议题始终让我着迷；但是会把文化差异带进学术研究本身来看“本土化”，却是经年累月在“问”、“被问”、“反问”与我所得、以及没有得到的答案之间发酵、沉淀而来的。

十多年前，在巴黎一次以全球化为题的演讲结束后，一位白发苍苍的教授来问：“为什么你不讲‘你（们）的’理论”？面对这样一个从未想过的问题，我只能坦白回说：“全球化理论就是这样”；“但东方有很深刻的思想传统”。他显然不满意我的答复，说完转身离去。又一次，和一位被我认为“狂热马克思主义者”、“思想不转弯”的朋友闲聊，无意间说出自己的疑惑：“为什么新旧马克思主义论述总把自由主义经济与文化视为对立的两个极端”？本以为这问题会触发对方热辣的反驳，不料这位德国学者竟回说：“有道理；问得好”！这答复同样让我出乎意表。巴黎老教授的问题让我开始思索“我”和“我的文化传统”与我所了解的理论之间的关连；而终生以马克思研究为职志的老友，则让我不得不认真面对“理论未必有效”，以及“所以又怎样”的问题。

问题引导思考，但有时没有问题，也同样逼人思考。一段时日后，我观察到口述这类对答绝少在本土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界出现——这又是

为什么？问到理论，我当年给法国老教授的答复：“人家理论就是这样”是常见的回应；也有更热心的学者建议：“先回去把它弄懂再问”。但就只有“没弄懂”才会有问题吗？在西方的思辩传统，问题是科学发现与知识建构的起点。常常是：有问题就没什么问题，没问题倒会有问题。或说华人不习惯发问与质疑，但重“体悟”与“转化”。问题是，我们的研究中展现了多少体悟的淬炼与转化的智慧？如果我们觉得不应该安于本土学术的现状，未来的路又要怎么走？

对于许多学者，“本土化”是问题的答案，而它也是一个学术自主的问题。“主体性”沦丧所造成的现象令人不安，由这个角度切入本土化议题十分自然。但是本土化概念有其含混之处。对我而言，今天华人学术发展所面对的也绝不只是一个学术帝国主义的问题，而是学术典范、教育体制与政策问题，更是历史文化问题——是一个关乎整体，而非只是“本土”或非西方学界的问题。文化是关键，也是所有上述因素背后的根源，它不是一个冰冷遥远的研究题材，也是研究的本身。我们要进入西方所建构的现代学术领域，无时无刻不在面对跨文化互动所可能出现的问题。脱离文化脉络去讲“主体性”，不但很容易让我们落入“文化中心主义”的陷阱，许多无解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本书是根据作者于 2011 年编辑出版的英文著作：《传播研究去西方：不同的问题与框架》（*De-Westernizing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ltering Frameworks and Changing Questions*）中，自己执笔的三章发展而成。这本书的付梓，也是一连串因缘际会的产物。2007 年我由香港回到台北执教，当时一个有关传播研究本土化的“顶尖大学研究计划”主持人出缺，给了我一个重拾此一研究议题的机会。说“重拾”，是因为 1998 年起，我已经开始了这一主题的跨学门计划，但是在举办了几次工

作坊、以及初步资料搜集之后，始终没能在工作的转换中，得到进一步开展的机会。2007年的“顶大计划”提供了一个平台——两年期间由工作坊发展出国际学术会议，会议论文再分别由《亚洲传播期刊》(*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与劳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出版，至此告一段落。同一时间，台湾政治大学提供的“讲座研究费”，让我得以开启了一个颇为浪漫的“中西对话系列丛书”计划，希望能借由深入历史文化脉络去讨论各学门的关键概念，为未来建构本土论述铺路。然而系列专书第一、二本所得到的反应让我了解，对大部分学界人士，“本土化”的意义、作法与牵涉的因素，还是相当陌生与模糊。困心含虑的推敲，使我兴起了撰写本书，以及调整系列丛书方向的念头。

由文化角度来看本土学术有助于拓展视野，但也令我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是“本土化”所牵涉的议题，逼使我远远离开了自己熟悉的传播研究，进入许多颇为陌生的领域——包括哲学、诠释学，甚至中东以及南亚近代史。这其中的每一个领域都足以令人倾毕生之力去钻研；而我只是一名过客、一名粗暴的掠夺者，贪心地各处寻找可以灌溉本土议题的活水泉源。书写过程中的另一挑战，是我提出的论述，是否能够通过自己所定立的标准达到自己期许他人的目标？每一支射向别人的箭，都有两支对准自己。但不论顾虑有多少，在学术的领域，态度可以谦虚，但在“表述看法”方面，却需要“(野人)献曝”的勇气。学术思想的衍展，贵在我们检验别人主张的同时，别人也检验我们的主张——包括我们对别人主张的检验。在这样的思维之下，我不揣浅陋，提出自己的看法，准备接受批评与检验。本书中对于第一代本土化论述的检讨与评论，也是在这样的思维下展开的。

检讨与评论的目的不在否定或抹煞，而是对话与讨论——这也是本

书的目的。事实上,由人类历史来看,无论中国、欧洲或其他文明的传统,缺少了这一环,思想都趋向停滞。欧洲中古时期与中国在近两千年科举盛行时期,都出现思想的停滞现象。如果三百年前欧洲在抛弃神权时,一并抛弃了希腊传统,则今天的欧洲会是现在看到的欧洲吗?如果文艺复兴让欧洲的思想再度蓬勃发展,则华人学界何不能换个角度去审视“传统”?西方有一句谚语:“(替婴儿洗完澡)不要把婴儿连洗澡水一起倒掉了”。师法西方不必全盘否定自我;科举式思考不足取,何不回到中国历史上思想发展最蓬勃的春秋战国时期去寻找答案?诸子学说的论述方法与取径,难道没有值得我们参考借镜之处?这部分我们了解了多少?

经过近两千年思想上的限缩与百余年的自我否定,如今要求华人学界融合中西,启动一次学术上的“浴火重生”,绝非易事;但若今天我们不往前走,未来将益发地举步维艰。本土学术发展是一场接力赛,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把棒子丢掉、自我放弃。

本书大部分书稿是在退休之后写就的。我谢谢两岸四地在不同阶段给我宝贵意见的学界朋友,尤其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郭振羽教授、台湾政治大学钟蔚文教授、北京大学卓南生与程曼丽教授,以及香港浸会大学张佩瑶和黎翠珍教授。多年来他们给我的回应与鼓励,让我了解本土学术发展议题在不同华人学术社群的意义。此外青年学者——包括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班,以及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新闻史论青年师资特训班同窗会的成员——对于本土学术发展的关怀,更令我对未来充满期待。我也谢谢在整个书写过程当中担任助理的纪金庆。金庆总揽所有的“后勤任务”,他对于我各种“非典型”文献搜寻与分析指令的回应,是我思索问题很大的助力。令人神伤的,是学术上一路相伴的好友

张佩瑶教授，未及看到本书便已辞世。至于书稿能够问世，特别要谢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以及台北商务印书馆抛开利润考量、全力支持本书以及“中西对话系列丛书”简、繁体字版的出版。

最后，我谢谢我的女儿肇华和外子彭家发教授多年来的体谅与支持。当我离家远去新加坡与纽西兰闭门写作，老伴与家中老狗相伴，一天两餐便当度日。为了这本他口中的“天书”，到处帮我找资料，在夜晚灯下一字一句地耐心替我校订书稿。这些点点滴滴留在心头，丰富了四十年婚姻生活的色彩。

母亲任永温女士是我一生的精神支柱，而父亲公纪先生则是我的启蒙老师。现在回想起来，父母亲给我的教育其实蕴含了相当多元的文化思维。童年时期我曾因气喘病而休学，父母亲特地带我上阿里山调养身体。每天早上七点，父亲便把我叫醒，牵起我的手，在漫天晨雾的山中健走。蛛网一样的山径向四面八方延展，父亲往往不走熟路，却怂恿我去探寻未知的景色。他经常玩的一个把戏，是两手一摊，说：“迷路了”。此时八岁的我，就会豪气干云地带领父亲找路。近六十年后的今天，书写本书的经历很巧妙地牵连着我时在山中找路的记忆。不知道为什么，当年的我，对于“找到路”总是充满信心。

谨以此书献给先父母、家人，以及所有为本土学术发展努力不懈的有心人。

2013年9月15日于基督城寒舍